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精品入臺出版工程

「福建師範大學兩岸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學術論叢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百年學術論叢

第二輯

第一冊 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 李小榮 著

總策畫——鄭家建、李建華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二輯

漢譯佛典文體及 其影響研究

李小榮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第二輯．
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李小榮著．

鄭家建、李建華總策畫

-- 初版．-- 臺北市：萬卷樓，2015.12

10 冊；17（寬）x23（高）公分

ISBN 978-957-739-965-6（全套：精裝）

ISBN 978-957-739-955-7（第1冊：精裝）

1. 佛經 2. 佛教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7

104018417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二輯

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 ISBN 978-957-739-955-7

作者 李小榮

總策畫 鄭家建 李建華

出版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編輯 陳滿銘

發行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陳滿銘

聯絡 電話 02-23216565 傳真 02-23944113

網址 www.wanjuan.com.tw

郵箱 service@wanjuan.com.tw

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三

印刷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15 年 12 月

定價 新臺幣 36000 元 全套十冊精裝 不分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本書經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出版、在中國臺灣地區發行繁體字版

第二輯

總序

百年老校福建師範大學之文學院，承傳前輩碩學薪火，發掘中國語言文學菁華，創獲並積澱諸多學術精品，曾於今年初選編「百年學術論叢」第一輯十種，與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協作在臺灣刊行。以學會友，以道契心，允屬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之創舉。今再合力推出第二輯十種，嗣續盛事，殊可喜也！

本輯所收專書，涵古今語言文學研究各五種。茲分述如次。

古代語言文學研究，如陳祥耀先生，早年問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後執教我校六十餘年，今以九十有四耄耄之齡，手訂《古詩文評述二種》，首「唐宋八大家文說」，次「中國古典詩歌叢話」，兼宏觀微觀視角以探古詩文名家名作之美意雅韻，鉤深致遠，嘉惠後學。陳良運先生由贛入閩，嘔心瀝血，創立志、情、象、境、神五核心範疇，撰為《中國詩學體系論》，可謂匠思獨運，推陳出新。郭丹先生《左傳戰國策研究》，則文史交融，述論結合，於先秦史傳散文研究頗呈創意。林志強先生《古本《尚書》文字研究》，針對經典文本中古文字問題，率多比勘辨析，有釋疑解惑之功。李小榮先生《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注重考辨體式，探究源流，開拓了佛典文獻與文體學相結合的研究新路。

現當代語言文學研究，如莊浩然先生《中國現代話劇史》，既對戲劇思潮、戲劇運動、舞臺藝術與理論批評作出全面梳理，也對諸多名家名著的藝術成就、風格特徵及歷史地位加以重點討論，凸顯話劇史研究的知識框架和跨文化思維視野。潘新和先生《中國語文學史

論》，較全面梳理了先秦至當代的國文教育歷史，努力探尋語文教學中所蘊含的思想文化之源頭活水。辜也平先生《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史論》的歷史考察與學理論述，無疑促進了學界對現代傳記文學的研討與反思。席揚先生英年早逝，令人惋歎，遺著《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類型與闡釋空間》，集三十年學術研究之精要，探討當代文學思潮和學科史的前沿問題。葛桂录先生《中英文學交流史（十四至二十世紀中葉）》，以跨文化對話的視角，廣泛展示中英文學六百年間互識、互證、互補的歷史圖景，宜為中英文學關係研究領域之厚實力作。

上述十種論著在臺北重刊，又一次展現我校文學院學者研精覃思、鎔今鑄古的學術創獲，並深刻驗證兩岸學人對中華學術文化同具誠敬之心和傳承之責。為此，我謹向作者、編輯和萬卷樓圖書公司恭致謝忱！尤盼四方君子對這些學術成果予以客觀檢視和批評指正。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堅信，關乎中華文化的兩岸交流互動方興而未艾，促進中華文化復興繁榮的前景將愈來愈輝煌燦爛！

汪文頂

謹撰於福州倉山

二〇一五年季冬

緒論

在中國的佛學領域，對教義、教派和教史的研究，始終佔據著主流的位置，無論教內、教外，概莫能外。至於本文所要討論的漢譯佛典之文體學，乃是文學理論或宗教文體學的研究範疇，但不管從佛學研究還是從文學、文體學研究的層面看，成果都相對較少¹，既欠系統性，也尚未建立起研究範式。

一 相關研究成果簡介

與本課題相關的研究成果，筆者擬從四大方面加以介紹。

（一）佛經文學、翻譯文學及譯經史論

在古代中外文學交流史上，佛經文學與翻譯文學的關係最為密切。²若回顧近現代學術史，便不難發現，從翻譯文學的角度來理解

1 在此，筆者試舉一例：比如上世紀七〇年代後期，臺灣的張曼濤先生主編過一套一百冊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臺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1978年），其中關於佛教文學研究的只有第十九冊《佛教與中國文學》。又，國外也存在類似的狀況，如日本，拿其著名的佛教研究刊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來說，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共計出版了一百多期，但刊載的屬於佛教／佛經文學（含文體學）的論文也屈指可數。雖然最近三十年來，國內的情況有所改觀，但整體而言，佛教／佛經文學的研究，尤其是佛經文體學的研究，依然處於邊緣化的狀態。另外，有關漢譯佛典文體之本位研究的情況，各專章再專門介紹，此不復贅。

2 在中國佛教經典中，還有疑經和偽經之說。其中，翻譯來源不明者，叫做疑經；不是譯自梵本或西域原本而模仿相關經論而成者則叫偽經。兩者雖和佛經傳譯之文化

佛教經典是學術界常用的研究模式之一。這方面代表性的論著，在上個世紀上半葉有：梁啟超一九二〇年撰成的《翻譯文學與佛典》³，胡適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話文學史》⁴，周一良先生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撰出的《論佛典翻譯文學》⁵等。進入新時期以後，相關的成果日漸增多，既有資料性的整理⁶，也有扎實的研究論著與論文集的問世⁷，尤其是不少碩、博士學位論文，都選擇佛經文學來做專題研究。⁸

活動關係密切，但不能算在佛經文學的範圍之內，按我們的理解，可歸到佛教文學的序列。再則，談中國的翻譯文學，一般也是先從佛經翻譯談起，如孟昭毅、李載道主編：《中國翻譯文學史》（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即如此。其主旨雖在論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翻譯文學，然而第一編《概論》卻從「梵鐘漢響，佛緣浩天」起首。復次，對於漢文佛典的專題介紹，可參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臺北市：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

- 3 梁啟超：《中國佛教研究史》（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頁81-134。
- 4 案：胡適是書特設〈佛教的翻譯文學〉上、下兩章，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把漢譯佛經文學納入了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範圍，其在學術史上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此後的文學史寫作，毫無例外地都有佛經翻譯或佛教文學方面的內容，特別是在講中古文學史時，比如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上海市：光明書局，1929年）、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平市：樸社，1932年）、張長弓：《中國文學史新編》（上海市：開明書店，1935年）等。這種做法，至今仍是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撰寫中的通例，例多不復贅。
- 5 《申報》「文史副刊」第3-5期（1947-1948年）；又附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市：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190-199。
- 6 新時期有關漢譯佛經文學的資料性選本較多，學術價值較高的有王邦維：《佛經故事選》（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85年）、陳允吉、胡中行主編：《佛經文學粹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孫昌武：《漢譯佛典翻譯文學選》（天津市：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
- 7 這方面重要的論著有：侯傳文：《佛經的文學性解讀》（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年）、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王立：《佛經文學與古代小說母題比較研究》（北京市：崑崙出版社，2006年）等。
- 8 比如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臺北市：東初出版社，1996年）；梁麗玲：《〈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公司，1998年）、《〈賢愚經〉研究》（臺北市：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吳海勇：《中古漢譯佛經敘事文學研究》（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4年），溫美惠：《〈華嚴經入法界品〉之文學特質研究》（臺北市：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李昀瑾：《〈撰集百緣經〉及

至於佛典翻譯史及譯經理論方面的研究，重要的論著有梁啟超《佛典之翻譯》⁹，橫超慧日〈釋道安の翻譯論〉¹⁰，宇井伯壽《譯經史研究》¹¹，村田忠兵衛〈五種不翻是非〉¹²，稻城選惠《淨土三部經譯經史の研究》¹³，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佛典重譯經研究與考錄》¹⁴，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¹⁵，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¹⁶，許里和《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¹⁷，吉津宜英〈真諦三藏譯出經律論研究〉¹⁸，蔡佳玲《漢地佛經翻譯論述的建構及其轉型》¹⁹等。它們或是對譯經制度的形成、譯場機制的運行、譯經理論的演變、譯學人才的培養及翻譯和本土文化的關係進行闡釋，或是對具體譯師的個案研究，或是談譯經理論對中國文論的影響，都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另外，在譯學／譯介學的理論檢討中，一

其故事研究》（嘉義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林韻婷：《〈雜阿含經〉譬喻故事研究》（臺北市：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等，都是以具體的某部或某類經典為切入點，進行文學上的闡釋，或兼及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性研究。

- 9 載梁啟超：《中國佛教研究史》（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頁155-254。
- 10 橫超慧日：〈釋道安の翻譯論〉，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卷第2號（1957年3月），頁120-130。
- 11 宇井伯壽：《譯經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
- 12 村田忠兵衛：〈五種不翻是非〉，《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4卷第1期（1975年12月），頁52-57。
- 13 稻城選惠：《淨土三部經譯經史の研究》（京都：百花苑，1978年）。
- 14 案：二書分別由臺北市的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史哲出版社於一九八四年、一九九三年刊行。
- 15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臺北市：東初出版社，1990年）。
- 16 案：是書為（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初版。
- 17 案：該文原題為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發表於一九九〇年。本人參考的是顧滿林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成都市：巴蜀書社，2001年），頁286-312。
- 18 吉津宜英：〈真諦三藏譯出經律論研究〉，載《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61號（2003年3月），頁225-285。
- 19 案：是文為（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二〇〇七年碩士論文。

般也少不了佛經翻譯的內容，如謝天振、孔慧怡、陳福康、王宏印等人的相關論著。²⁰

(二) 語言學

佛經漢譯是異質文化的交流，涉及語言學上的許多問題，故而在國際漢學界中得到了不少學者的重視，在語音學、辭彙學、語法學諸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茲擇要分別介紹如下。

自法國馬伯樂《唐代長安方言考》²¹、俄國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²²發表之後，研究漢語音韻流變的學者，大多都會引用漢譯佛典裡的寫音資料來擬定某些音韻的實際音質，如汪榮寶、羅常培、俞敏、施向東、儲泰松等。²³另外，隨佛經翻譯傳入中土的悉曇

20 謝天振：《譯介學》（上海市：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孔慧怡：〈中國翻譯傳統的幾個特徵〉，載孔慧怡、楊承淑編：《亞洲翻譯傳統與現代動向》（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5-37；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市：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宏印：《中國傳統譯經論典闡釋市：從道安到傅雷》（武漢市：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1 案：馬伯樂是文原為法文，發表於一九二〇年。本人所參考的是聶鴻音先生的漢譯本（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年）。

22 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國學季刊》第1卷1號（1923年1月），頁47-56。

23 具體可參看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國學季刊》第1卷第2號（1923年4月），頁241-263；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1分（1931年8月），頁121-158；羅常培：〈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東方雜誌》第32卷第14號（1935年6月），頁35-45；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62；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頁27-48；施向東：〈十六國時代譯經中的梵漢對音（韻母部分）〉，《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2001年1月），頁1-4；儲泰松：〈梵漢對音與中古音研究〉，收入載孔令達、儲泰松：《漢語研究論集》（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81-295、儲泰松：《施護譯音研究》（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96-319等。另外，朱慶之：〈佛典與漢語音韻研究——二十世紀國內佛教漢語研究回顧之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2輯（成都市：巴蜀書社，2000年），對上個世紀相關研究情況有詳介，可參看。

學，對漢語音韻學、詩律學的形成與發展起過巨大的促進作用，對悉曇學進行過深入研究的主要有陳寅恪、田久保周譽、季羨林、饒宗頤、丁邦新、林光明、王邦維、周廣榮等。²⁴

漢語佛經辭彙學的研究，在上個世紀前半葉涉足者尚不多²⁵，但最近三十年來，卻成了漢語史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成果極其豐碩，如顏洽茂、朱慶之、李維琦、梁曉虹、汪維暉、胡敕瑞、王紹峰、季琴等人²⁶，皆從細讀原典出發，同時結合傳統的世俗文獻，考

24 具體可參看陳寅恪：〈四聲三問〉（原載《清華學報》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後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367-381）、田久保周譽：《批判悉曇學》（東京：真言宗東京專修學院，1944年）、季羨林：〈玄奘《大唐西域記》中「四十七言」問題〉，《季羨林文集》（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7，「佛教」，頁361-367、季羨林：〈梵語佛典及漢譯佛典中四流音rūṇ問題〉（《季羨林文集》〔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7，「佛教」，頁368-404）、饒宗頤：〈印度波你尼仙之園陀三聲論略〉，《梵學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79-92、饒宗頤：〈文心雕龍聲律篇與鳩摩羅什通韻〉（《梵學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93-120、〈唐以前十四音遺說考〉（《梵學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59-174）等，丁邦新〈平仄新考〉，《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64-82；林光明：《梵字悉曇入門》（臺北市：嘉豐出版社，1999年）；王邦維：〈謝靈運〈十四音訓敘〉輯考〉，《國學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3，頁275-300；周廣榮：《梵語〈悉曇章〉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北京市：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25 案：這裡筆者把一些佛教辭典排除在外，當時真正從佛經原典入手研究漢語辭彙學的人並不多。其中，周一良的《能仁與仁祠》（原載《燕京學報》第32期，〔1947年6月〕，後收入《唐代密宗》，頁177-189）、水野弘元的〈tathāgata（如來）の意義用法〉，《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卷第1期（1957年1月），頁41-50，我個人認為是學術精品，且有開風氣之先的學術史意義。

26 參見顏洽茂：《南北朝佛經複音詞研究——《賢愚經》、《雜寶藏經》、《百喻經》複音詞初探》（大連市：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81年）、《佛教語言闡釋——中古佛教辭彙研究》（杭州市：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辭彙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2年）；李維琦：《佛經釋詞》（長沙市：嶽麓書社，1993年）、《佛經續釋詞》（長沙市：嶽麓書社，1999年）；梁曉虹：《佛教辭彙的構造與漢語辭彙的發展》（北京市：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又，梁曉虹和徐時儀、陳五雲合著：《佛經音義與漢語辭彙研究》（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釋出不少辭彙的新義項，總結了漢語辭彙發展的一些規律，對佛典的閱讀極有助益。

至若漢譯佛經語法研究的成果，相對於語音學與辭彙學則要少些，但也有高品質的論著問世，如太田辰夫、曹廣順、遇笑容、楊如雪、龍國富、許建宇等。²⁷

最後說一下，本來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來考察漢譯佛典，是國際佛教學研究的通例，但由於這種方法的運用要求研究者具有多種語言的文化素養，故從事者總體說來不是很多。²⁸而且，在國內能真正利

2005年)也是相關研究的力作;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胡敕瑞:《〈論衡〉與東漢佛典辭彙比較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2002年);王紹峰:《初唐佛典辭彙研究》(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季琴:《三國支謙譯經辭彙研究》(杭州市: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 27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曹廣順、遇笑容,“*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ed Later Han Buddhist Sutr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載二人論文集《中古漢語語法史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2006年),頁199-229);遇笑容:《梵漢對勘與中古譯經語法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頁150-160);楊如雪:《支謙與鳩摩羅什譯經疑問句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7年);龍國富:〈姚秦佛經中的事態助詞「來」〉,《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六輯(2003年12月),頁121-139;《姚秦佛經助詞研究》(長沙市: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十誦律》中的兩個語法成分〉,《語言研究》2004年第2期,頁95-97、〈漢語完成貌句式和佛經翻譯〉,《民族語文》2007年第1期,頁35-44、〈佛經中的雙層同指疑問與佛經翻譯〉,《漢語學報》2008年第1期,頁11-18;許建宇:《〈佛本行集經〉定中結構研究》(杭州市: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又,朱慶之、朱冠明:〈佛典與漢語語法研究〉,《漢語史研究集刊》(成都市:巴蜀書社,2006年),第9輯,頁413-459,有更詳細的介紹可參看。

- 28 在此,我僅舉一些特別突出的例子,如鋼和泰:《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26年);季羨林:〈浮屠與佛〉,《季羨林文集》(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7,「佛教」,頁1-27、季羨林:〈再談「浮屠」與「佛」〉,《季羨林文集》(南昌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7,「佛教」,頁345-360;Rie Hisamits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athagatayuhpramanaparivarta and its Chinese Versions (Suvānaprabhāsa-sūtra, chapter II,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用這些成果的漢語佛教文學研究者就更少，這應當是我們以後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佛教文學

在宗教文學的研究領域，「佛教文學」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研究的成果也相對多些。

從近現代學術史考察，較早提出「佛教文學」的是英國學者比爾（Samuel Beal, 1825-1889）²⁹，隨後它便成了東亞文化圈相關研究中的常用詞之一。如日本方面，就有小野玄妙、鈴木暢幸、深浦正文、藤井智海、加地哲定、平等通昭、入矢義高等著名學者³⁰，在自己的

Academy of India Culture, 1983); 前田至成等:《梵本藏譯漢譯合璧·阿毗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業品·隨眠品》(京都:永田文昌堂,1986年);中村瑞隆,譯叢編委會譯:《梵漢對照〈究竟一乘寶性論〉研究》,《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76冊(臺北市:華宇出版社,1988年);辛島靜志:《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in the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of the Versions》(The Sankibo Press,1992)、《長阿含經原語の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正法華經詞典》(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1998年),古阪絃一:《〈大隨求陀羅尼〉におおける梵藏漢文の比較研究》,《インド學密教學研究:宮阪宥勝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京都:法藏館,1993年),下卷,頁201-208;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1992年2月),頁40-80;蔡耀明:《吉爾吉特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第13期(2000年6月),頁1-128,鄭國棟:《〈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品〉梵漢對勘》,《華林》(北京市:中華書局,2003年),卷3,頁135-151;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會編:《梵藏漢對照〈維摩經〉(Vimalakirtinirdesa: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東京: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2004年)等。

29 Samuel Beal, *Buddhist Literature in China* (案:初版於1882年,筆者讀到的是1988年 Delhi 的重印本)。

30 小野玄妙:《佛教文學概論》(東京:甲子社書房,1925年)、鈴木暢幸:《佛教文學概說:國文學研究者のために》(東京:明治書院,1931年)、深浦正文:《新稿佛教文學物語》(京都:永田文昌堂,1952年)、深浦正文:《佛教文學概論》(京都:永田文昌堂,1970年)、藤井智海:《佛教文學の意義とその本質》,《印度學仏教學研究》第10卷第1號(1962年1月),頁298-303、加地哲定:《中國佛教文學》(案:

論著使用了該詞。但是，他們對佛教文學的理解並不完全相同，其中小野玄妙、深浦正文等人把佛教經典中具有文學意味的經典視為佛教文學的範疇，這可看作是一種狹義的理解，它基本上等同於前面所講的佛經文學。

臺灣學者丁敏教授則從更廣的角度，把佛教文學分成兩大部分：

一是佛教經典的部分。自阿含以來的各大小乘經典及律藏中，都有許多充滿文學色彩的地方。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緣、本事、譬喻更是經典文學中的主流。另一是佛教文學創作部分。即以文學手法來表現佛理，帶有佛教色彩的文學創作。包括歷來文人、僧人及庶民的佛教文學創作，表現在小說、戲曲、散文、詩歌及俗文學中的作品。³¹

如果把這種理解加上地域的區分，則可限定中國、日本、韓國或其他國別的佛教文學之範圍。其中，佛經翻譯文學是佛教文學產生的根本前提，而受佛教義理、修行實踐、教儀行事等影響而產生的文學作品，則是佛教文學的主體。易言之，佛經文學是涵蓋在了佛教文學的範圍裡頭。比如，業師陳允吉先生主編過《佛經文學粹編》和《佛教文學精編》³²，前者全部選自漢譯佛典，後者則分為佛經文學、通俗文學、詩文小說三大領域，此既表明了兩者的聯繫，也揭櫫了其間的區別。

1965年日文初版，筆者參考的是劉衛星譯本，北京市：今日中國出版社，1990年）、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學の研究》（橫濱市：印度學研究所，1969-1983年），卷1-3。案：三卷分別為《梵文佛所行讚の研究》、《大事譬喻譚の研究》、《梵文大事譬喻譚に於ける本生話の研究》，入矢義高：《佛教文學集》，《中國古典文學大系》（東京：平凡社，1975年），卷60。

31 丁敏：〈中國佛教文學研究近況初步評價——以臺灣地區為主〉，《中國佛教文學的古典與現代：主題與敘事》（長沙市：嶽麓書社，2007年），頁184。

32 陳允吉、陳引弛主編：《佛教文學精編》（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中國佛教文學的研究，魯迅、陳寅恪、顧隨、臺靜農、周一良、錢鍾書、季羨林、饒宗頤等前輩，都有精彩的傳世之作。改革開放三十年多來，在這一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則有孫昌武、陳允吉、白化文、項楚、王小盾、周裕鍇、謝思煒、蔣述卓、張伯偉、張海沙、胡遂、普慧、吳言生、陳引弛等。對大陸與港臺地區的研究情況，孫昌武、丁敏、林朝成與張高評都做過較好的綜述³³，筆者就不重複。

統觀國內已有的研究，大致有如下幾個特點：一，從教派言，最受學人重視的是禪宗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研究³⁴；二，從文體形式言，小說（敘事文學）、詩歌（抒情文學）、戲劇最受青睞；三，從方法言，影響研究最為常用，即通常是找出某作家與某宗派（或某經典）的聯繫，然後再展開文學主題的論述；四，從使用材料言，多數依靠的是漢文佛典及相關的世俗文獻，對非漢語的佛典多數學人表現冷漠，甚至是視而不見；五，從研究取向言，到目前為止，學術界的主流是從士大夫文學的視閥來討論佛教文學的生成、演變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但也有不少學者，主要是從民間文學（俗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視閥來探討佛教文學，代表人物有鄭振鐸、季羨林、劉安武、劉守華、王曉平、薛克翹等³⁵，他們的影響也不小。特

33 參孫昌武：〈漢文佛教文學研究概況及其展望〉，收入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上·文學語言卷（北京市：中華書局，1995年），頁130-138；丁敏：〈中國佛教文學研究近況初步評價——以臺灣地區為主〉，《中國佛教文學的古典與現代：主題與敘事》（長沙市：嶽麓書社，2007年），頁184-226；林朝成、張高評：〈兩岸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課題之評介與省思——以詩、禪交涉課題為中心〉，《成大中文學報》第9期（2001年9月），頁135-156。

34 具體研究概況，參看前揭林朝成、張高評文。

35 參看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北京市：東方出版社，1996年）、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安武：《印度文學和中國文學比較研究》（北京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5年）、劉守華：《比較故事學》（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劉守華：《比較故事學論考》（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曉平：《佛典·志怪·物語》（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王曉平：《遠傳的衣鉢：日本傳衍的敦煌佛教文學》（銀川市：寧夏

別是隨著大量敦煌文獻的整理與刊布，敦煌佛教文學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³⁶六，從學術視野言，對國際漢學的相關成果了解得不夠全面，對學術資訊不能及時掌握，故而低水準的重複勞動時有所見；七，佛教文學本身乃屬交叉學科，但是真正能同時深入佛教與文學之堂奧者比較少，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景：從文學研究出身的學人偏重於佛教文學中之「文學」部分，從佛教研究出身的學人則多對「佛教文學」不屑一顧，很少關注這一領域的進展。

（四）其他

與佛經／佛教文學研究關係較為密切的尚有文化傳播學、藝術學、歷史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比較宗教學、美學、民俗學等，尤其可借鏡的是它們對佛教問題的探討。現略舉數例如下：

眾所周知，世界上任何宗教皆可歸到文化的序列之中，佛教也不例外。佛教在印度的形成發展乃至東流華夏、朝鮮、日本等地的過程，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特殊文化的傳播及其產生影響的過程。雖然學術界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但是系統論述的專文，筆者見到的並不多。³⁷

佛教藝術，如果再細分的話，主要有佛教美術、佛教音樂和佛教戲劇。其中，前二種由於敦煌文獻的發現及敦煌學的迅猛發展，近百年來的成果極其豐富。單就敦煌變文與俗講而言，就和佛教繪畫、佛

人民出版社，2005年），薛克翹：《中印文學比較研究》（北京市：崑崙出版社，2003年）等。

36 孫昌武先生指出佛教俗文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敦煌俗文學（參孫昌武：〈漢文佛教文學研究概況及其展望〉，收入林徐典編：《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上，文學語言卷〔北京市：中華書局，1995年，頁130-138〕，筆者於此是隱括其意。

37 參看周伯戡：〈佛教初傳流布中國考〉，《文史哲學報》第47期（1997年12月），頁289-319；張曉華：《佛教文化傳播論》（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6年）；粘凱蒂：《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傳播活動之研究》（桃園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教音樂的關係極其密切。³⁸至於佛教戲劇，成果相對少些，但許地山、陳宗樞、朱恒夫、劉禎、凌翼雲、李強、康保成等，都有不小的建樹。³⁹最近，王志遠則對佛教藝術的總體特徵進行過較為深入的思考。⁴⁰

國內研究佛教史的學者，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名單，如蔣維喬、湯用彤、胡適、呂澂、黃懋華、陳垣、任繼愈、聖嚴、印順、郭朋、楊曾文、杜繼文、賴永海、葛兆光、麻天祥、魏道儒、洪修平等，對於他們的成果，境內學人都比較熟悉，就不一一列舉了。國外對此領域的研究，近百年來，論者層出不窮。尤其是日本方面，可說名家輩出，如忽滑谷快天、鈴木大拙、境野哲、宇井伯壽、塚本善隆、道端良秀、牧田諦亮、柳田聖山、鎌田茂雄、諸戶立雄等。⁴¹在歐美地

38 參看Victor H. Mair (梅維恒)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Cambridge, MA: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Victor H. Mair (梅維恒)，王邦維、榮新江、錢文忠譯：《繪畫與表演》(北京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2000年)及拙撰：《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39 許地山：〈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的點點滴滴〉，《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專號」(1927年6月)，頁1-36；陳宗樞：《佛教與戲劇藝術》(天津市：人民出版社，1992年)、朱恒夫：《目連戲研究》(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劉禎：《中國民間目連文化》(成都市：巴蜀書社，1997年)、凌翼雲：《目連戲與佛教》(廣州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強：《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北京市：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康保成：《中國古代戲劇形態與佛教》(上海市：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

40 王志遠：《中國佛教表現藝術》(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41 參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朱先生所譯僅是原著：《禪學思想史》之中國部分，而省略了印度部分，全譯本可參郭敏俊譯本，臺北市：大千出版社，2003年)、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一》(東京：岩波書店，1943年)、《禪思想研究第二》(東京：岩波書店，1951年)、《禪思想研究第三》(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禪思想研究第四》(東京都：岩波書店，1968年)、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綱》(案：是書被蔣維喬增刪改譯成：《中國佛教史》[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35年])、宇井伯壽：《支那佛教史》(東京都：岩波書店，1936年)、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6

區，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也有悠久的學術傳統，湧現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近年來為大家所熟知的有許里和、芮沃壽、陳觀勝、太史文、卜正民等。⁴²無論國內國外，其成果都足資借鑑。

考古方面，中亞與西域都發現了一些以漢、藏、梵、回鶻、犍陀羅、粟特等語文書寫的佛典，如香川默識、約翰·布魯治、瓦爾德斯密德特、魯道夫·赫恩雷、D.N. MacKenzie，藤枝晃、井ノ口泰淳、邵瑞琪、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等⁴³都編著過相關的文獻資料。其

年)，塚本善隆：《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京都：弘文堂書房，1942年）、《中國佛教史》（東京：隆文館，1965年），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東京：法藏館，1967年），牧田諦亮：《中國佛教史研究》（第一、第二、第三，東京：大東出版社，1981-1989年），柳田聖山著，吳汝鈞譯：《中國禪學思想史》（臺北市：商務印書館，1992年）；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上海市：譯文出版社，1986年），諸戶立雄：《中國佛教制度史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0年）。有關日本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概況，可參鎌田茂雄著、聖凱譯：〈近代日本的中國佛教史研究〉，《法音》2000年第2期（2000年2月），頁25-29。

- 42 參〔荷〕許里和著，李四龍、裴勇等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美〕芮沃壽（Arthur F. Wigh），*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陳觀勝（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太史文著，侯旭東譯：《幽靈的節日：中國中世紀的信仰與生活》（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加〕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另外，〔荷〕J. W. de Jong（狄雍）著，霍韜晦譯：《歐美佛教研究小史》（香港：法住學會，1983年），李四龍：〈論歐美佛教研究的分期與轉型〉，《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2007年8月），頁65-72、頁158，李四龍：〈美國的中國佛教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2004年3月），頁126-132，對相關情況有所介紹，可參看。

- 43 參〔日〕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北京市：學苑出版社據日本國華社1915年版影印，1999年），〔英〕約翰·布魯治（John Brough）：《犍陀羅語〈法句經〉》（*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德〕瓦爾德斯密德特（E. Waldschmidt）：《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寫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Wiesbaden: F. Steiner, 1965），魯道夫·赫恩雷（A. F. 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facsimiles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 Khotanese, Kuchean, Tibetan